

圣经与文学：阐释中的建构

——读弗莱的《伟大的代码》

王 宁

研究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无疑属于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特别是从事西方文学研究者更容易感觉到这一点，因为这一比较文学的新兴分支学科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多学科整合和超学科比较大趋势已变得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不仅研究文学的学者自觉地从宗教中寻觅文学创作的灵感，而且研究宗教的学者也开始把考察的视角触及文学作品，尤其是处于各种宗教变革时期产生的文学文本。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加拿大思想家兼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写于本世纪 80 年代的理论著作就是这样一个既对文学研究者有所启发同时又能为传统的宗教研究提供具有丰富文学内容的理论建构。

在本世纪的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领域内的最杰出学者和思想家中，弗莱的名字显然是十分醒目的。毫无疑问，弗莱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加拿大以及北美文化学术界，他被公认为当代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自从弗莱于 1957 年出版《批评的解剖》时起，国际学术界就开始了对他的研究，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从各个角度和领域对弗莱的研究著述真可谓汗牛充栋，但实际上，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弗

莱的影响还远不止研究者们所涉猎的领域。当今北美弗莱研究的权威性学者罗伯特·丹纳姆 (Robert Denham) 曾作过周密的考证,他从各国学者对弗莱及其著述的评述和引用的次数统计出,弗莱的地位应当排在马克思、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列宁、柏拉图、弗洛伊德和罗兰·巴尔特之后,是一位高踞于自己的时代之上的思想伟人,他应当被当作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家来研究。^①虽然在其生前及嗣后,西方学者已经对弗莱其人、他的学术遗产以及其原型批评理论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从各自的不同理论视角对这位承先启后的人物作了不同的解释,但时至今日,他在本世纪知识界和思想界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尤其是在超越固定学科之界限的综合研究中更是远不尽人意。

诚然,弗莱首先是被当作一位文学理论家得到观照的。在近30多年的弗莱研究中,大多数论者主要将弗莱当作一位文学理论批评家或文学学者来研究,所以,将弗莱理解为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并不为过,因为他本人就曾经把几千年来的西方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他考察的视角既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入手(如《批评的解剖》、《批评之路》等),又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法典圣经)入手(如本文即将论述的《伟大的代码》以及晚年出版的《权力词语》和《双重幻像》)。通过将不同时期和不同体裁的几百部西方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和研究,他力图建构一种“整体化”的批评理论。因而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这样一位跨越时代、跨越国界和固定学科界限的复杂人物及其有着多重文化宗教和文学代码的理论著述并非易事。弗莱对当代文化学术的贡献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作为一位文化哲学家或

^① 参见罗伯特·丹纳姆编《诺思洛普·弗莱: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注解性书目》(Northrop Fry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9页。

文化上的锐意革新者，他是一位有着致力于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的理论家，他的批评理论中既有着新批评的影响，同时又不时地显露出对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评思想的引证，因而他的批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元批评”的叙述。其次，他是加拿大文化学术界在国际上的主要发言人，他的学术思想和批评理论曾一度从“边缘”步入“中心”（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然后又退出其中心地位（70年代初后结构主义崛起以后），成为后一代学人们所考察研究和质疑甚至重构的“当代经典”。第三，弗莱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曾以其独树一帜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学者，说他的理论曾一度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批评在西方文论中起过“三足鼎立”的作用（雷内·韦勒克语）也不为过，而且直到80年代后期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北美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以来，我们仍可以在弗莱为《加拿大文学史》撰写的两篇结论中觅见后殖民理论家所关心的中心/边缘和“非边缘化”/“非领地化”等热点问题。第四，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元批评理论家和超学科比较文化研究者，弗莱的理论对结束英美“新批评派”在英语文学界的一统天下之地位和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的兴起也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概括，弗莱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但同时又能与当今任何一个批评流派进行对话；他的理论著述决不只蕴含有一种代码，而是有着更多相互关联甚至相互矛盾的代码共存和抵牾，因而便使得他的批评思想对今天的批评论争仍有所启迪。这就对我们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之角度来阐述弗莱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十分精当地描述过弗莱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弗莱的伟大之处以及他的著述与那些众多的一般性神话批评

之间的重大差别就在于，他善于提出具有共同性的问题，并从作为集体表现的宗教性中得出基本的、本质上具有社会性特征的解释性论断。”^①对于这一特征，我们完全可以从他的重要著作《伟大的代码》中见出端倪。按照詹姆逊的看法，弗莱的神话理论还带有某种具有启蒙性的“非神秘性”，而且越到他的晚年，这种矛盾性就越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著述中。弗莱是一位同时具有社会关怀和神话关怀的批评家，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全然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弗莱及其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就在于，他使得文学批评摆脱了封闭自足的学院派领地，从而将文学研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 and 跨学科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称他为一位“文化批评家”或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是颇为恰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今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大潮的冲击下弗莱的意义大有被重新发掘之势的原因所在。

我们说，弗莱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独树一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本人的宗教背景。可以说，《伟大的代码》实际上起到了沟通文学与宗教这两个学科和表现领域的桥梁作用。正如弗莱在书中对圣经的精妙阐释那样，他自己的理论实际上也隐含着多种代码，因而也有着供读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阐释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弗莱作为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始终居于他所生活的两个时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充满了矛盾，而正是这种多重矛盾的张力才使他的理论不致于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应有的价值。因此可以确切地说，他是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后一位巨人，同时也是步入后现代时代后北美批评界第一位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我们今天可以从各家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中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0页。

窥见弗莱的影响和踪迹。弗莱及其理论对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论争也不无意义，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他大胆地将民间传说和神话等亚文学体裁包容进文学的话语，从而打破了高级文学与低级文学之间的界线；（2）他使文学研究参照其他学科及表现领域，如宗教学、人类学、神话学等，从而打破了狭义的文学批评的自足性和整体性；（3）他对加拿大文学之“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提及在当今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讨论和研究中也得到了回应。这样看来，对弗莱的全方位研究在中国只是刚刚开始，^①有些领域可以说至今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比如说，对弗莱的宗教思想的研究以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就是一片空白。

我们说，弗莱的文学研究超越了文学本身的领地，主要是旨在将他视为一位伟大的文化批评家。正如现在的情形所示，在当今的西方理论批评界，文化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提到文化研究，人们自然会想到英国的 F. R. 利维斯、理查德·霍佳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人的贡献。但正如加拿大学者汉密尔顿所指出的，在这个名单后面还应当加上来自加拿大的弗莱，^②因为他之于文化研究的意义越是到当今越是为人们所认识。可以说，正是由于上述几位学者的努力，文化研究已成为近几年来在西方学术理论界风行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和跨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它开始时仅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文学经典的途径来

^① 在这方面，由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诺思洛普·弗莱研究”将对中国的弗莱研究和加拿大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该项目由我本人主持，最终成果包括四本编、译著作：《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伟大的代码》、《批评之路》，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6—1998年出版。

^② 参见 A. C. 汉密尔顿提交给“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1994年，北京）的论文，《作为文化批评家的诺思洛普·弗莱》，中译文见拙编《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一书，第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提高整个读者大众的文学水平和审美修养，因此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的精英主义意识。后来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文化研究才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汇入到当代文化研究的大潮中。文化研究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文化，或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文化研究兴起的范围主要是英语文学界，因而首先对弗莱所从事的两个领域——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我们可以从文化研究的发展道路看到它与弗莱的学术生涯的相似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英国文学或经典文学研究出发，逐步通过反形式主义而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地，最后又从文学内部对之进行解构，从而实现范围更广泛的文化批评。在这方面，弗莱始终站在当代文化研究的前列，为其在90年代的崛起进而迅速步入中心地带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者，除少数加拿大学者外，却很少提及弗莱的这一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研究弗莱的文化批评思想，我们是无法回避他的宗教思想的，因为作为加拿大联合教派的首领，弗莱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读实现了文学与宗教的联姻，从而将文学的文化批评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关怀，上升到一种“神话关怀”和“宗教关怀”。可以说，这正是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的弗莱与其他仅有着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的文化批评家的不同之处。

关于弗莱的宗教思想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一般总要提到他的三本书，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因为它在弗莱的著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同时也与他本人的双重身份不无关系：杰出的文学批评家、研究者和联合教派的首领人物。这本书的写作充分体现了弗莱在上述两个领域里的深厚功力和渊博学

识，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算作另一部与《批评的解剖》相媲美的论著。照弗莱自己的解释，“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研究圣经。原先我想写一部有关圣经意象和叙事的比较深入的导论，并且说明圣经中的这些内容怎样构筑成了一个幻想的框架——我把这个框架称为神话世界”。^①他的这种构想不仅对他同时代和后代的加拿大作家，如爱丽斯·门罗、马格丽特·劳伦斯、马格丽特·艾特伍德等人的创作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对探讨文学和宗教这一超学科比较文学的重要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精当的范例。弗莱生前长期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授课，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以一位纯经验学者的身份来著书立说，而倒更像是一位宗教的传教士那样，首先向学生启蒙，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讲义整理成书出版。这表明，弗莱一反那种陈腐的学究式考证，代之以一种流畅优美的文学风格，把充分体现基督教教义的圣经的基本观点和意义启示给文学研究者。曾经有人断言，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宗教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基督教的历史，也就是说，各个时代的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从圣经中获得启迪，因此研究西方文学，没有对圣经的最起码的理解显然是无从下手的。正是在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弗莱的这种尝试使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更为密不可分。

作为一位生活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西方文学研究者和英国文学教授，弗莱集中讨论的是基督教圣经，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他所熟悉的文献，同时这一文献对他所研究的英国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传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位非经验研究文学批评家，弗莱对具体的文学形象更有兴趣，因此枯燥乏味的基督教教义在弗莱

^① 参见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导论”，第11页，哈考特·布拉斯出版公司，1982年版。

的文学笔触的重新阐发下变得尤为栩栩如生。正如弗莱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的,“这本书不是一本有关圣经的学术性著作。它远不是一部理论著述……我很快就认识到,学习英国文学的学生如果不了解圣经,就会对所学的作品在许多地方无法理解,其结果是勤于思索的学生就会不断地对作品的内在含义、甚至意思产生误解”。^①但是对圣经的掌握既不可断章取义,又无法以其毕生的精力去专门研究它,这样看来,借助于现成的研究成果便有助于研究者从整体上来把握其精神实质。应该说,弗莱的这本书是一部有相当权威性同时又具有可读性的“圣经导读”:“……圣经从古到今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它也以一个整体影响着西方的想象力。”^②对想象力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创作上,同样也体现于理论的建构和批评实践中,缺乏想象的批评决不能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批评,对此,弗莱是深有体会的。例如,他在书中不无正确地指出,“在今天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有许多问题来自对圣经的解释学研究。当代的许多批评方法就是隐隐约约地受到有关上帝死了的种种说法的激发而产生的,而上帝死了的说法也是来自圣经的文学批评。我觉得文学批评理论中有许多系统阐述如果应用于圣经,比起应用于别的任何地方都更加能站住脚”。^③可以说,弗莱的这些论述足以表明他已经超越了早期的自律式文学批评模式,介入了结构主义之后的文化批评的理论争鸣和对话。

正如前所述,《伟大的代码》是基于弗莱在多伦多大学的多年教学实践而写成的,除去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外,它还试图依循作者早年致力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学的解剖之传统对圣经与文学的关系作一番评述,尤其是圣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弗莱

① 参见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导论”,第11—12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同上书,第19页。

深深地认识到，当今的不少文学批评理论都可追溯到对圣经的引证和讨论，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来阐述圣经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效果，使理论不致于陷入枯燥乏味的逻辑推演和智力角逐之中。正如乔纳森·哈特所指出的，“这本书的结构就像圣经一样是一个双面镜”，^①也即它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圣经，使之具有神秘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又透过圣经这面镜子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原型作出全新的观照。毫无疑问，在这里，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弗莱并不反对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但“像弗莱这样一位有着既/又（both/and）思维模式的批评家，他试图对各种可能性开放，并对多种角度开放”，^②也即在他看来，伟大的文学作品，甚至包括可以当作文学文本来阅读的圣经文本，总是包含有多重文化和审美代码，而批评的作用之一就是对其之进行阐释，以便在阅读和阐释过程中建构出新的意义，这正是他的晚期著述受到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注意的原因所在。而相比之下，“价值判断只是批评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而非批评的主要作用”，^③因此“弗莱认识到圣经的题材是如何充满了情感因素的，并指出，学术的目的并不是旨在接受或拒斥这一法典”。^④全书分为两编，前后呼应，互为补充，形成一个整体。第一编包括四个章节：第一章关涉人们用来谈论圣经的语言及其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赖以将圣经当作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影响物加以观照的语境；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了神话和隐喻，尤其是这二者是如何与圣经的字面意义相关联的，并通过这种关联来逐步破译其代码；第四章探讨了俗权及其与基督徒阅读圣经的传统方式之间的联系。第二编则较为直接地将批评的原理应用于圣经的结构。第五章一开始就涉及了启示的七个阶段：创造，出

^{①②③④} 这部分引文出自乔纳森·哈特《诺思洛普·弗莱：理论的想象》（Northrop Frye: *The Theoretical Imagination*），第四章，第109—142页，伦敦和纽约：路特利兹出版社，1994年版。

走，律法，智慧，预言，福音和启示，然后一一对之作了详细阐述；第六章和第七章实际上分别对圣经的意象和叙事结构作了归纳和综述，使人对圣经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第八章则再次对所谓“宗教修辞”作了探讨，并简略地考察了其多重意义，为读者指出了一个始自字面意义通向破译代码的方向。显然，弗莱依循自己熟悉的循环式、周期性或戏剧性结构，带领读者穿过这类型学的车轮的静止点，直取本书的核心部分。应该说，作为文学家的弗莱完全是以文学叙述的方式来阐释圣经的，因而其独特之处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恰恰是这本书在意义建构和价值重建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突破。

毫无疑问，《伟大的代码》的写作标志着弗莱已经从一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新批评的自足式本体论批评传统的人文批评家转变为一个将文学批评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宗教语境下的广义的文化批评家，因此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弗莱的研究证明了“西方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宗教史”的论断。由于圣经历来被当作基督教的经典教义文本来诵读和铭记，因此我们又可说，西方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作基督教的教义与文学的美学表现之渊源关系的演变史。在这方面，这部著作堪称一独特的范本。但是与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佳特、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文化批评家所不同的是，弗莱同时具有神话关怀（concern of mythology，也即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和社会关怀（concern of society，也即形而下的世俗关怀），因而从本质上说来，他仍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所立足的主要领域仍然是文学，但他已经开始自觉地将文学研究靠向社会科学的阐释方法了。更进一步说，他所关注的始终是想象性文学，而非学究式的考据和纯理论推演，这一特征无疑也体现在这本书的写作上。同样，这也就是他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而不同于一般的宗教思想家的独特之

处。因此在他眼里，“圣经是一部浩瀚的神话，是从创世到启示这整个时期的叙事，是由一系列反复出现的意象组成的统一体。这些意象‘凝结’成为一个单一的隐喻群，所有的隐喻都认同于弥赛亚的肉身，这人就是所有的人，这整个的‘道’就是一个‘道’，这是一粒沙又是整个世界”。^①可以说，在圣经这个浩瀚的海洋里探宝本身就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作者单位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① 参见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导论”，第224页，哈考特·布拉斯出版公司，1982年版。